

从无政府主义到民主：鲁迅五四时代的小说

塞巴斯简·魏格

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经研究过无政府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地位¹。他指出，虽然1919年五月四日游行的主要要求是“民主”和“科学”，但民主概念的具体内容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政治理论的很大影响，比如强调个人的发展、个人对国家的独立、思想——而不是政治制度——的革命。五四活动分子离开政治体系的改革，转而强调精神革命的必要当然也跟整个的历史背景有关，这个历史背景就是他们所感觉到的从清末到袁世凯统治政治制度改良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选择用文学来改变社会，也是为了避开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而首先将民间的民主化当成关键问题。虽然五四的时候已经发表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的一些代表文章，包括在吴稚晖与李石曾在巴黎“左翼”无政府主义、或者刘师培在东京“右翼”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上，可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社会精神上或者说哲学概念上最重要。德里克强调两个主要概念：第一，五四时代的民主观基于对权威——包括国家的权威——的彻底批判，主张个人对所有的等级制度的解放；第二，五四运动建议一个文化性的革命，相信人类的可完善性，主张用教育而不用暴力改变社会。这种精神革命当然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相反的。

这种支持非国家的民主化跟以前的改良主义不仅在目的上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也使文学变成民主化的最重要工具。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设想》曾经写道：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力量来自它对历史的连续性的打破能力。这是一种艺术性的，美感性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就是前卫艺术和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点。五四运动的作家主张从事小说，尤其鲁迅在《呐喊·自序》写到他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人）的精神”，也来源于这种对文学的打破能力的信仰。用写作——就是一个完全个人的行为——来打破传统规范，促进社会的民主化，同时完全避开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也显示对民主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精神。在下文中，我想进一步分析鲁迅五四时代的小说一方面与他对历史连续性的象征决裂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他的民主观的关系，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对他的民主观的影响。

¹ 参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鲁迅 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这篇小说在政治辩论里一下子就被视为一颗攻击儒教文化的炸弹，鲁迅同时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新小说的代表作家。关于施蒂纳（Max Stirner）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对这篇小说的影响，汪晖曾经作过很详细的分析²。小说里的狂人对自己的社会的反叛是完全个人的；它来自一种完全主观的意识——在夜里非正常时间的寂寞中发现的、被别人无法确认的恐惧感。同时，狂人的态度毫无政治内容：他对传统的反叛是伦理性的，他问梦里来的人的是“吃人的事，对么？”，再次问“从来的事，便对么？”。他自己对“吃人”传统的拒绝是根本的、原则的，跟社会事实、政治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毫无关系的伦理上的抗议。这种根本主观的反叛只能存在于私人空间。鲁迅在小说里用文人笔记式的日记形式也说明这一点：在公共空间里这种反叛必定要视为“疯狂”，无法存在。日记一从兄弟家里出来之后，就作为一种怪物，“以供医家研究”。如果用文言文谈及主人公在社会、政治制度里的位置，就象在《序》里一样，那只能用“狂人”这个字来取消他的反叛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狂人”和无政府主义的彻底的、纯粹伦理的个人反叛是有一定关系的。

同时，他的“疯狂”不仅是被社会扣的帽子，而且从他自己的意识上说也是他夸大主观性的结果。他对旧社会制度的揭发毕竟也害及他自己，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肯定也曾经吃过人。梦里的人也跟他说：“你说更是你错”。揭发传统的真面貌对个人来说，同时也是揭发他自己的犯罪，这毕竟是一个太沉重的负担，使他自寻灭亡，导致他精神的分裂。所以他的“疯狂”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真理，而且是个人忍受不了真理的具体结果。他彻底的反叛只能引起这种失败。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描写跟俄国的虚无主义相似的个人反叛，同时也表达了对完全根于主观性的世界观的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狂人的日记也代表文学作品的作用。像日记一样，小说面临一种危险或者说一种限制：如果当作一个纯粹的个人伦理行为，仅仅反映主观性对世界的否定，它就不能打开一个公共的政治空间。像无政府主义活动分子的炸弹一样，它爆炸之后不能引起对政治制度的讨论和交流。五四运动主张写小说主要是为了离开腐败的国家机关与政治制度，直接去改变社会的思想。但是，如果鲁迅与整个五四运动的代表作《狂人日记》代表了愿望的高潮，它就同时也体现了小说对改变社会的无能。虽然有炸弹的暴力，但是像炸弹一样在爆炸中自

² 见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32-334页。

我毁灭。只有孤独的叛徒才能彻底否定传统，但是他的反叛在文学作品之外的实际里不能存在。

鲁迅 1921 年发表的《阿 Q 正传》里的民主观和三年前《狂人日记》中的有一定的差别。美国学者 Marston Anderson 曾经详细分析过小说的结尾，指出在阿 Q 等枪毙时，周围的“大团圆”里没有一个正当的位置：很明显，审判阿 Q 的有权者凭不公平的手段判处他死刑；但也不能就此认为阿 Q 没有罪，因为他虽然没参加赵家的偷窃，可本来愿意参加，还大声骂假洋鬼子没让他参加，后来指出偷窃是“杀头的罪名”，希望假洋鬼子会“杀头——满门抄斩”，就是支持最残酷的传统刑法。所以阿 Q 也不像一个无罪的无产阶级。阿 Q 临死的时候要喊一声，但是好像来不及说话。在“救命”的喊叫之后，读者会看到“然而阿 Q 没有说”这一句。Anderson 指出，按照逻辑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叙述者自己喊出“救命”³。但是叙述者以他相当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没有权力分清是非：如果阿 Q 也不能算无罪，他凭什么道理要救他？最后，未庄的居民也下了一个判断：“自然都说阿 Q 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读者当然也接受不了这种道理。所以，从审判者、被审判者、叙述者和旁观者这四个方面，都找不到一种正当的政治原则。从政治革命过程来看，判处阿 Q 也不对；可让阿 Q 按照自己的想法搞革命仅等于杀人偷窃，那也不正当。从政治原则价值来看，既说要“救”他不对，又说他“坏”也不对。因此小说的结尾在价值观上可以说是一条死胡同。鲁迅在小说里虽然强调改变社会的必要，但是确定不了革命的原则。这种没有原则的、完全否定性的政治态度，也和无政府主义的民主观有一定关系。

《阿 Q 正传》与《狂人日记》的不同之处，是文学本身的正当性。从《狂人日记》来看，小说本身进不了公共空间，因为它表现了一种根本主观性的反叛，而它的意义被《序》取消。在《阿 Q 正传》里，虽然叙述者也有自己的主观偏见，但是小说的最后一章描写一种关于政治变革的讨论，除了叙述者以外也存在其他的声音。虽然读者可能找不到一个正当的政治位置，但是他读完之后还能自己考虑怎样建立一种更民主的政治制度。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说明他要让读者反对阿 Q，同时要让他感到自己也是阿 Q。这样以来，鲁迅是在迫使读者去思考政治原则。

³ 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76-92.

所以，通过一篇小说也可以打开一种公共空间，在这种空间里来讨论政治变化的原则。《阿 Q 正传》第九章的“大团圆”也可以当作这个空间的象征。哈贝马斯和其他的政治学家，比如法国的 Claude Lefort，都强调了这一点：民主制度的特征就是他无法提前确定政治价值，但是还必须保障一个讨论原则的空间。Lefort 特别指出，在民主制度的中间必须有一个空的位置，因为没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⁴。这可能是无政府主义对民主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跟五四运动的民主观有一定的共同点。

鲁迅无论相信小说的一种本性的政治力量，还对所有的政治体系保持深刻的怀疑。同时，用跟现实分开的小说改变现实也是一个具有矛盾的愿望。另外，虽然他的民主观，从很早以前一直到 30 年代与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几乎没有关系，但是从 1918 年的“狂人”到 1921 年的“阿 Q”也出现一定的变化，主要是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使读者参加确定民主规范的过程。很多学者已经强调了这种非国家的民主化是五四运动的最大的历史弱点；其实也可以算是它对中国民主的一个大贡献：事实上，虽然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浸染的民主批判空间不是民主完成的形式，但也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阶段。这样，五四运动、尤其是鲁迅的小说、也可以作为民主化中无政府因素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Sebastian Veg, 男, 1976 年生于美国纽约,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 2004 年普洛旺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自 2006 年, 香港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2004 年发表了《彷徨》法文版。电邮: sveg@cefc.com.hk。

⁴ Claude Lefort, *Essais sur le politique. XIX^{ème}-XX^{ème} siècle*. Paris : Le Seuil, « Points essais », 2001.